



## 口述 抗战史

## 自造地雷炸敌人



时业学（1927年—），山东省海阳县人。1943年组织成立窑头村民兵组织并任队长，打击日本侵略者。曾获海阳县“模范民兵”称号。

日本侵略者当年到我家乡山东海阳县时，烧杀抢掠，简直无恶不作，仅1940年至1945年，侵略者就多次到我家乡山东海阳县扫荡。一次，日本侵略军扫荡时来到海阳县窑头村，放火烧了村里的三间房屋，把村民家的粮食全都抢走，用刺刀刺死了2名男青年和1名妇女。

1943年8月，我们村里的几位青年不甘祖国被人侵略、村庄村民被人烧杀，在县人民武装委员会的指导下，毅然成立了窑头村民兵组织，和邻近的赵疃村和文山后村的民兵共同展开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。

当时，日本侵略军在我们海阳县设立了“行村、小记、凤城”三个据点。为了打击侵略军，阻止其烧杀抢掠，我作为窑头村民兵队长，摸索学习起用地雷打击日军



■ 民兵土法制作地雷

图 TP

的方法。我们在邻近两个村的民兵队长赵守福、于化虎的教授下，按照“一硝、二磺、三木炭”的土办法，逐渐掌握了如何制造地雷的方法，先后制造出“石雷、踏雷、绊雷、拉雷、钉子雷、梅花雷、虚实雷、子母雷”等20多种地雷，并以民兵骨干为主，发动村民制造炸药，自造地雷。

一次，在小记据点的日本侵略军要对附近村民实行“三光”（烧光、杀光、抢光）政策，得知消息后，我就带领村里民兵和邻近村的民兵联合起来打击日军。夜晚，民兵们渐渐地靠近小记据点附近的村庄，夜幕下远远望见一棵大树上好像有一树叉下垂，走进一看吓了一跳，月色下只见树

上吊着一个人，一个被日本侵略军扒光了衣服全裸的妇女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日军在奸杀这位妇女时，对尸体横加摧残，将一只玻璃瓶塞在妇女的下身处，民兵们强忍悲愤，发誓要为村民报仇。

夜色下，村里民兵们在敌人据点周围多处埋设了地雷，天微亮时，民兵们开始放枪，把敌人引

向事前埋设好地雷的道路和村子。日军进了村后，盲目开枪扫射，结果四处挨炸。就连日军进村家捣毁家具时也被炸，日军被炸得血肉横飞，死伤多人。此后，日军惶惶不可终日，坐立不安。为此，家乡人民还特地编了个顺口溜：“海阳铁西瓜，威力大，炸得鬼子四脚朝天喊爹妈；海阳铁西瓜，威力大，今天炸，明天炸，誓把鬼子赶回家。”当时，海阳的老百姓个个都会说这个顺口溜。

在打击日本侵略者时，我们海阳人民用地雷战的方法，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，每个村庄、每户家庭都成为一个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，先后作战2000余次，毙伤俘敌1900余人，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。日军前来扫荡、抢粮时，不管其走到什么地方，甚至上茅房、掀锅盖、拉家具，都被地雷炸得魂飞魄散，以至于鬼子不敢再轻易进村。

1944年，我又加入其他部队，在江南一带继续打击日本侵略军。

后来拍电影《地雷战》，赵守福、于化虎就是民兵队长赵虎的原型，其中也有一些我的故事。现在，在我的家乡山东省海阳县建有地雷战纪念馆，馆里的一件件实物和日本侵略军犯下的罪行，以及所展现的当年用地雷战英勇杀敌的英雄事迹，成为我们牢记历史，以史为鉴最好的教材，我们只有牢记历史，和平才能永久。

（袁玮 龙钢 整理）

## 记忆中的抗战 征文

## 姚医生崇明岛上打鬼子

姚志修



■ 姚春英

先父姚春英，1914年生于崇明一个自耕农家庭。1932年起拜名医赵克勤为师，白天在商店站柜台，晚上学医。三年满师后在堡镇开设诊所执业。他对贫困的农民不收诊金，农民感激不尽，病好后就把自养的鸡鸭送到祖父母处。从那时到日军侵占崇明的三年期间，家中羊舍里的鸡鸭经常满棚，家里的生活也比较安逸富裕。

1938年3月18日，日军侵占崇明，派重兵驻守堡镇。先父毅然关闭诊所，6月参加了抗日游击队，还特地到海门县拜见了崇（明）启（东）海（门）（南）通抗战创始人、

组织者和最高实际领导瞿犊。不久，他担任“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”（崇总）分队长。他通过多种方式武装白手起家的抗日队伍：

巧夺日军武器。他观察到日军在堡镇操练时，先将步枪成垛支放，然后进行队列训练，队列走到最远处相距枪支100多米。他就组织大量便衣人员观看日军早操，等士兵徒步走到最远时，突然窜出抱起步枪就走，等日军发觉追过来时，他们已经消失在人群里找不到了。他本人的盒子枪则是从日军伙食事务长那里夺来的；与崇明三区游击队领导人金有祥一起，收缴了大地主沈大有私人自卫队的全部枪支；袭击清剿百姓痛恨的土匪部队，缴获机枪十几挺，步枪近300多支；取得开明士绅的支持，如中兴镇爱国蔡姓“粮户”经常供给游击队钱粮。

先父谨慎选择队员，在弃用的工商大地主黄德隅宽敞宅地（现竖新镇政府所在地）设立队部，严格管理和训练部队，使该分队成为崇明最有战斗力的一线部队之一，经常担任最重要的战斗任务。

1938年10月23日，在瞿犊指挥下，游击队分三路进攻伪军在堡镇的据点，先父带领分队主

攻杜少如宅日军指挥所，使日军龟缩在里面不敢出宅。这一仗是侵崇日军第一次遭受较大规模的袭击，鼓舞和提高了崇明人民的抗日情绪。1939年8月2日，他奉命与友邻部队在城堡公路旁的白祠堂附近伏击日军两辆运兵车，经过激战，击毙日军12名，击伤8名，日军最终开车调头逃走。这是侵崇日寇首次在交战中伤亡惨重并逃离。

1938年秋至1940年上半年，日伪军在游击队打击下死伤惨重。他们疯狂反扑，1940年7月调来驻吴淞的青海川部斋藤渡江的数千日军，对崇明大肆烧杀，几十个村庄被烧成废墟，数十甚至上百名手无寸铁的百姓被害，8月6日我家族19间房屋被焚毁，祖父和婶婶被日军活活烧死，几岁大的堂兄被日军刺刀划破额头后丢在山芋田里……先父怀着满腔怒火，按新四军的安排，将部队转移至江北海门，继续开展斗争。

在崇明本土抗战处于低潮的日子里，汉奸特务十分猖獗，经常捉拿转入地下的中共党员和游击队队员，一时形势非常险恶。先父在江北知晓后，只身潜回崇明，处死了惠民乡一个作恶多端的伪保长。在马桥乡他突然出现在一个

伪保长的家里，责问他为何帮助日寇侦查游击队。伪保长说“我不好，耳朵根软，听信了敌人的话。”先父听后，揪住其一个耳朵说：“这只耳朵根软，没有用了。”唰的一声将这只耳朵割了下来，警告其今后不得与游击队作对。消息传开，汉奸们大为惊恐，其卖国行径受到极大震慑。

从1940年8月到1944年5月，先父在南通、海门、启东等地先后担任新四军连长、民主区区长和通海行署总队作战参谋等职务。1940年12月，他所属的三旅四团驻防如皋掘港，遭到顽军徐承德部数千兵力的围攻。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，先父临危不惧，同战友一起，激战三昼夜，从“崇总”转移来的战友牺牲9人，1人伤重不治，但最终守住了阵地。在其后开辟民主政权的岁月里，先父和群众的关系犹如鱼水，在群众的掩护下，他数度与敌遭遇都化险为夷。有次他被日伪军追赶，就躲到一户结婚人家，该人家连忙将其手枪扔到婚床顶上，给他穿上厨师衣服围兜。日伪进来时，先父在其眼皮底下若无其事地烧菜，敌人搜索无果，只得快快而退。

1944年5月，通海行署决定在崇明重组抗日武装，并为从上海向苏北抗日根据地转运军需物资

提供帮助，上级将此重大任务交给先父、朱澜洲和陈震岳三人。当时国民党在崇明本土的抗日力量也极为薄弱，先父就去浦东接洽国民党崇明县长，县长委任他为三区公所助理，并发给枪支。他们整合了小股地方武装，神出鬼没地破坏敌人公路，处死汉奸走狗，崇明抗战又出现了新气象。9月下旬，先父只身去通海行署汇报请示工作，回崇后在三人小组内做了传达。28日清晨他被日军包围在永隆镇龚姓教师的宅上，突围时中弹受伤被俘。日寇抓到他后用玉米秸插入他腿部伤口，用脚踏他腹部，要他交代同伙。面对日寇淫威，他大声怒斥，毫不屈服。敌人无计可施，令当地人将他抬到伪乡长宅上，途中他下定视死如归的决心，悄然摘下手表送给后边抬他的人。到达伪乡长宅不久，他口吐血壮烈牺牲。囿于当时情况，大伯父用芦席和竹帘包裹遗体草草掩埋。此前一个多月，叔叔被伪军刺死，我家前后4人为抗战殉难。

1945年8月抗战胜利。1946年11月10日《新崇报》刊登标题为《东乡姚烈士忠骸安葬》的报道云：“其忠骸于十一月二日，已运归三区竖河镇祖墓安葬，当日各界欢送往吊者，达千余人之多。”